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俄果戈理 研究动态综述

刘洪波

(北京大学, 100871 北京)

摘 要: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中俄果戈理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在俄罗斯, 这种新动向的主要表现是对果戈理晚期创作的关注和重新阐释以及随之而来的在宗教语境中对其整体创作进行重新解读的趋势。在中国, 这种新趋势则刚刚起步。

关键词: 果戈理; 研究; 新动向; 宗教语境

中国分类号: I06

文献标识码: A

如今, 复古已成为一种时尚, 一种风气。唐装、中国结卷土重来, 小学生又背诵起孔孟老庄。不单是我们中国, 俄罗斯也如梦初醒般地开始找寻民族的东西, 普希金 200 周年大庆、隆重出版卡拉姆辛的《俄罗斯国家历史》就是证明。这恐怕也是一种世界性的现象。当人类文明长足发展到 e 时代的时候, 人们突然发现, 跑得太快了, 就要成为断线的风筝了, 于是, 大家又纷纷回过头去寻各自的根基, 试图接续传统, 重获能量。所以重读经典可以说是大势所趋。在这样一种大的形势下, 果戈理研究也不例外。

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起, 苏联的果戈理研究有了新的动向。这种新动向最先是从事果戈理生前发表的最后一部著作《与友人书简选》(以下简称《书简选》)的再评价开始的。

1978 年, 尤里·曼(Юрий Манн)曾经试图重新解读果戈理的《书简选》, 认为“《书简选》对于当时的时代而言是一本反映了隐秘的危险症状的、有代表性的书。”(Ю.Манн 1986:466)1979 年出版了伊·佐洛图斯基的《果戈理传》。与以往传记不同的是, 佐洛图斯基在这部传记中再现了果戈理创作《书简选》前后的背景环境, 指出果戈理在 1843—1844 年间通过读书, 特别是宗教方面的书籍, “深造自己”, 还大量摘抄和背诵圣书及罗蒙诺索夫、杰尔查文、克雷洛夫、普希金等人的著作, 从中“为自己意识的更新汲取了力量。”“他的创作在他的内部进行着。”(И.Золотусский 1984:466-467) 不过, “他打算创作一部长诗——结果写出来的是一部书信; 他打算建造自己的‘宫殿’, 但却继续在砌台阶, 或是从台阶过渡到宫殿的什么别的东西。”(И.Золотусский 1984:469) 佐洛图斯基称《书简选》是诗人“果敢的自我表白”, (И.Золотусский 1984:494) “他继承了俄罗斯文学传统(文学一向被认为是‘共同的善良的事业’的一部分)。……俄罗斯作家在表现自己的思想的时候, 也同时追求一个目的——使俄罗斯的生活高尚起来, 使它达到理想的境地, 哪怕是局部地达到也好! ……果戈理比自己的前辈走得更远。他让自己的文学事业超出了文学的范围, 把‘精神生活’摆在文学事业的位置上。……他带着自己裸露的心灵出现在读者面前, 准许读者进入自己的精神

生活。”(И.Золотуский 1984:494-495)认为果戈理打破了文学的“禁区”，让《伊戈尔远征记》、《阿瓦库姆大司祭行传》中先知式的声音在《书简选》中再度响起。他希望在俄罗斯人人走上自我完善的道路，认为每个人都履行自己的职责是社会完善的前提。佐洛图斯基指出，这一点正是果戈理和别林斯基的分歧之所在——别林斯基提出的是社会改革。在分析了两者的思想分歧后，佐洛图斯基说，他们尽管在书信对话中各持己见，“但是在内心中，每一方又都在思考着另一方的正确道理。”(И.Золотуский 1984:550)

因佐洛图斯基以完全不同于以往的视角和观点对果戈理的生平和创作进行了重新诠释，从而引发了 80 年代初围绕着对经典的重新评价问题展开的激烈论争，有关《书简选》的部分成为争论的焦点。一些著名学者在《文学问题》杂志上公开辩论：有赞成佐洛图斯基的，如萨哈罗夫(В.Сахаров)在其《文化的逻辑与天才的命运》一文中认为，佐洛图斯基的《果戈理传》虽说在有的地方也犯了自作主张的错误，但有关《书简选》的一章写得最成功，再现了《书简选》当时的情境，在评论上没有顾忌，说出了全部，而不是一部分。这是《果戈理传》一书最有力的地方。斯卡托夫(Н.Скатов)的《向前迈进》一文肯定了佐洛图斯基，说他正确地修正了别林斯基对晚期果戈理的一些评价，但同时指出，并不能就此宣布革命民主主义批评的“破产”，因为革命民主主义批评自身是一种复杂的、异常变动的、有时是矛盾的现象：车尔尼雪夫斯基对别林斯基进行了修正，杜勃罗留波夫又比车尔尼雪夫斯基进了一大步。应当倾听不同的声音，避免评价中的片面性。也有反对佐洛图斯基的，如日丹诺夫(В.Жданов)在《如何对待历史的真实》一文里针对《书简选》一章指出，作者在详细分析《书简选》一书的同时，阐明了因别林斯基那封著名的信而与果戈理之间形成的关系之全部症结，这种为果戈理洗刷不白之冤的愿望可以理解。但对别林斯基的信的巨大作用和意义却少有阐释，也没有对谁是谁非的重要问题给出直接回答，容易给读者造成一种印象，好像一切都是由于别林斯基病态的易怒导致的。日丹诺夫责问，作者说别林斯基回国后“放弃了自己在查尔兹布隆所写的那封信的结论”，(И.Золотуский 1984:54)如此责任重大的说法，用什么来证明呢？杰缅季耶夫(А.Дементьев)也对此不满，他在《当需要捍卫老生常谈时》一文中认为这种说法完全不对，佐洛图斯基是对别林斯基有成见，所以没有提及别林斯基信的优点和意义，仅仅停留在“过分”和“没有击中目标”上，这种写法使别林斯基的观点给人的印象是反面的。莫福强(П.Мовчан)也反对佐洛图斯基，但他是从另一个角度着眼。他的《以笔法攻击》一文把佐洛图斯基的书当作是主观的“假说”，认为果戈理在这里被解构，被削去桂冠，而随着僵化的老生常谈一起消失的还有果戈理的伟大。他认为佐洛图斯基的主要手法是，先搞出一个假说，然后像说一个定论一样地去说它，就像做数学题，一开始就出错，那么错的就不是运算过程，而是结果。同期，沃尔金(Игорь Волгин 1980:246)也在《新世界》杂志上撰文(Уроки Гоголя)评论佐洛图斯基的书，指出：“佐洛图斯基成功地深入到晚期果戈理的秘密之中。”作者用心去激活僵死的历史空间，“书中所描绘的生活保留了其原始的、动态的丰富性，……佐洛图斯基关于果戈理的话语与果戈理的话语不矛盾，它既不补充，也不为了自己方便而改变果戈理的话语，它紧张地倾听果戈理话语的声响，努力领会最微不足道的半音和意味并心怀感激地回应这声音。这是话语一回声，但它有着自己相应的动机。”(И.Волгин 1980:243)两年后，别尔德尼科夫(Г.Бердников 1982:224)在《关于对古典文学遗产的党性态度》(О партийном отношении к классическому литературному наследию)一文中也涉及了佐洛图斯基的《果戈理传》，认为作者是在与别林斯基争辩，要证明“别林斯基对《书简选》做出的评价草率、急躁，无论如何不能说是公正的。作者企图让我们相信，好像别林斯基自己从给果戈理写信的国外回来后也明白或开始明白了。”别尔德尼科夫认为佐洛图斯基在行文时耍手腕，避重就轻，目的是把别林斯基致果戈理的信一笔勾销；认为导致对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人的论断进行置疑的是一种观念，即革命民主主义者们的社会决定论是错误的。别尔德尼科夫批驳了这种观念，指出，“这些错误是背离历史主义和党性原则的结果……”(Г.Бердников 1982:230)

这场争论揭开了果戈理研究新阶段或者说新方向的序幕。这一新的方向是在被谢·冈察洛夫(С.Гончаров 1997:3)概括为“反思世俗与宗教文化相互关系问题的潮流”的大形势下形成和发展的,其主潮是把文学创作纳入宗教道德的语境中进行研究。杜纳耶夫(М.Дунаев 1996:5)在其力作《东正教与俄罗斯文学》的《导言》中明确指出:“俄罗斯文学为东正教理想所圣化,这就是俄罗斯文学的主要特色——这首先是东正教的文学。”他认为,东正教在俄国生活中根深蒂固,“无论俄罗斯人的社会和个人生活怎样迷失在诱惑的黑暗的迷宫里,其精神罗盘的指针依然固执地指向原来的方向,……”(М.Дунаев 1996:13)因为“教义……实际上对人的世界观、对人在存在中的地位的意识、对人的思维方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不仅如此,教义还形成民族性格、民族历史的政治和经济特色、民族的命运。”(М.Дунаев 1996:6)“正是东正教影响了人对自己精神实质的持续关注、对内心的自我深化的持续关注,这种关注被文学所反映,这也是俄罗斯的世界观和俄罗斯的生存方式。”(М.Дунаев 1996:5)因此,俄罗斯文学的宗教性成为其固有的、本能的特点。俄罗斯文学的这种宗教性“完全不在于与教会生活的简单联系或者对《圣经》情节的特别关注。俄罗斯作家在看待生活事件、人物性格和人们的追求时,用《福音书》的真理将之照亮,在东正教的范畴内去思考。这不仅表现在直接的政论性作品中(如果戈理的《书简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家日记》),而且还表现在文艺创作上。”(М.Дунаев 1996:4)但是,“俄罗斯古典文学的这一基本特点却没有被研究者和批评家们所触及”,(М.Дунаев 1996:3)宗教哲学家们无疑是从宗教的观点看待文学的,但他们的专业不是文学批评,因此他们对这个或那个作家的创作的点评都是片断式的。杜纳耶夫在这里否定了别林斯基以来的传统的文艺学观点,认为把俄罗斯古典作家的价值局限在对专制农奴制度的揭露、批判激情和为人民的幸福而斗争上,即使有一定的道理,但这与俄罗斯文学最主要的东西——宗教的、基督教的世界观比起来,也不过是抓住了次要的东西。他认为,“从文学的社会分析或审美分析转到宗教分析”(М.Дунаев 1996:7)是必然趋势,目前这种转变刚刚开始。

杜纳耶夫在这里指出了俄罗斯文学研究的新趋向,这是不容否定的事实。但他说俄罗斯古典文学的社会意义即使存在,与宗教意义相比也是次要的,实质上是否认俄罗斯文学的客观社会意义,片面强调其宗教层面的内涵,这也是一种片面性,与传统的文艺学无视俄罗斯文学的宗教性一样片面。

具体到果戈理研究上,在80年代,这种转变还只是开始,传统的观念和研究套路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在普希金之家1984年召开的纪念果戈理诞辰175周年讨论会上,伊耶祖伊托夫(А.Иезуитов)博士的一句话很能说明问题:“在深远的历史前景中并从马克思列宁主义方法论的立场上研究文学遗产——这是摆在当代苏联文艺学面前的重要而光荣的任务。”具体说来,赫拉普钦科(М.Храпченко)的专著《尼古拉·果戈理。文学之路。作家之伟大。》(Николай Гоголь. 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путь. Величие писателя)(1984年)、尼古拉耶夫(Д.Николаев)的《果戈理的讽刺》(Сатира Гоголя)(1984年)、马柯果年科(Г.Макогоненко)在《星》杂志1984年第4期上发表的文章《他属于俄罗斯》(Принадлежит России)及专著《果戈理与普希金》(Гоголь и Пушкин)(1985年)、斯米尔诺娃(Е.Смирнова)的《果戈理的长诗〈死魂灵〉》(Поэма Гоголь «Мертвые души»)(1987年)、叶寥米娜(Л.Еремина)的《关于尼·瓦·果戈理艺术散文的语言》(О языке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прозы Н.В.Гоголя)(1987年)、曼(Ю.Манн)的专著《果戈理的诗学》(Поэтика Гоголя)(1988年再版)、马尔科维奇(В.Маркович)的《尼·瓦·果戈理的彼得堡故事》(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е повести Н.В.Гоголя)(1989年)等是传统研究方向的卓越成果,但是,在这些著作中对于以《书简选》为代表的果戈理晚期创作基本不去触及,或者认为其晚期创作中表现出的宗教救世思想即或在其实现实主义创作的高潮期就已经存在,甚至在前期创作中也时有表现,可是它们在果戈理的艺术创作中并不占重要地位(赫拉普钦科就持此观点)。除了这些研究成果,80年代还出版了一本文论集——《19世纪40—50年代俄罗斯美学与批评》(Русская эстетика и критика 40-50-х

годов X I X века) (1982 年) 以及其他的文献资料, 如沃罗巴耶夫 (В.Воропаев) 的《书籍之于果戈理》(Книги для Гоголя) (1983 年), 它们为后期研究奠定了基础。

1989 年, 在纪念果戈理诞辰 180 周年之际, 情况明显发生了变化。安年科娃 (Е.Анненкова)、巴拉巴什 (Ю.Барабаш)、沃罗巴耶夫 (В.Воропаев)、高尔杰别尔克 (А.Гольденберг) 等研究者的文章主要探讨以《书简选》为代表的后期创作, 关注其宗教层面的东西, 甚至把《死魂灵》也纳入这个视界进行研究。

进入 90 年代后, 这一趋势变得越来越强劲, 出现了一系列专著:

1993 年, 巴拉巴什发表《果戈理——〈诀别的故事〉之谜》(Гоголь. Загадка «Прощальной повести»), 这是一部专门研究《书简选》的专著。这本书对《书简选》进行了全面研究和重新评价。他指出, 《书简选》是属于艺术家果戈理的创作现象, 与《死魂灵》之间联系密切, 研究《书简选》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死魂灵》。他强调书中的宗教意蕴, 但也指出, 《书简选》“纯粹是政论, ……但是掺入了宗教酵母的政论, 掺入了与基督的形象和学说有关的问题的政论。”在书的结尾巴拉巴什提出了一个新的选题——果戈理的“民族之谜”。

1997 年, 巴夫利诺夫 (С.Павлинов) 出版了《果戈理的哲学寓言》(Философские притчи Гоголя)。书中首次在研究果戈理的彼得堡故事时运用当代古意钩沉学方法, 揭示深藏在果戈理作品中的哲学的、宗教的底蕴。

同年, 冈察洛夫发表专著《宗教神秘主义语境中的果戈理创作》(Творчество Гоголя в религиозно-мистическом контексте)。他指出, 果戈理的创作与古代和新的宗教训导传统紧密相关, 这并不是空穴来风, 把果戈理当作宗教类型的作家来研究他的基督教思想始于 20 世纪初。而今, 在这一研究传统的基础上, 果戈理研究面向基督教文化语境, 从根本上改变了对果戈理创作进程的认识。“如果说以往只是在研究后期创作, 也就是宗教问题表现明显的《书简选》时, 才考虑到基督教文化, 那么近年来它已逐渐成为(研究)成熟期, 甚至是早期创作的必要语境。”(С.Гонгаров 1997:4)

1998 年, 巴夫利诺夫又发表了一部著作——《精神之路——尼古拉·果戈理》(Путь духа. Николай Гоголь.), 着力分析果戈理最后 10 年的创作成果:《戏剧散场记》、《〈钦差大臣〉的结局》、《书简选》、《作者自白》、《关于宗教礼拜仪式的遐思》、《死魂灵》第二部等。

同年, 马尔高里斯的专著《果戈理的〈书简选〉一书——接受的重要历史阶段》问世。这本书侧重于描绘《书简选》问世以来其在各个历史时期的遭遇及读者的态度。走进研究者视野的主要有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梅烈日科夫斯基、格尔申宗和巴拉巴什, 他们分别代表不同的接受时期、态度和角度。总体上, 不同方向的解读不外乎两种角度: 一个是宗教道德的, 另一个是社会的。马尔高里斯认为, 从研究《书简选》的接受史中我们能够感悟到文化对话的必要性。

1999 年, “重读经典”系列丛书第 22 卷出版了沃罗巴耶夫的《尼·瓦·果戈理——生活与创作》。作者对果戈理的主要作品《钦差大臣》和《死魂灵》进行了分析, 并补足了以往研究中忽略的生平和创作的一些方面, 勾勒出果戈理作为一个作家和一个人的精神道德形象。

维诺格拉多夫发表于 2000 年的《艺术家和思想家果戈理——世界观之基督教基础》(Гоголь. Художник и мыслитель. Христианские основы мирозерцания) 一书也是近年果戈理研究方面的力作。专著在果戈理创作道路的全进程中揭示了其世界观的基督教基础, 指出其核心是对宗法制俄罗斯生活方式的热爱及对欧洲世俗化的物质进步的批判。

此外, 不少副博士、博士学位论文也以宗教视野下的果戈理研究为课题, 如普吉钦柯 (М.Птиченко) 副博士的《果戈理的宗教探索》(1994 年)、冈察洛夫博士的《果戈理的创

作与宗教训导文化传统》(1998年)、热拉文娜(Л.Жаравина)博士的《1830—1840年俄罗斯文学中的哲学—宗教问题: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1996年)。

至于报刊杂志以及各类研讨会论文集上的文章更是层出不穷。由于篇幅的关系无法一一列举。除了上述研究性成果,在重新整理、出版果戈理的文学遗产方面也取得了不小的进展:80年代再版了2卷本《果戈理选集》(1985)和7卷本《果戈理文集》(1986);90年代出版了《与友人书简选》(1990)(包括《书简选》、《作者自白》、《世上生活的准则》、《尼·瓦·果戈理的遗嘱》)、《关于宗教礼拜仪式的遐思》(1990)、《宗教散文》(1992)、《中篇小说。死魂灵:长篇史诗》(“俄罗斯经典”系列丛书)(1999);21世纪初出版了《中篇小说。死魂灵》(“经典的学校”系列丛书)(2000)以及新的《果戈理全集》第一卷,最近又出版了《果戈理百科全书》。

近年来出版的各种类型的文学史中对果戈理的介绍和评价也借鉴了新的研究成果,对果戈理的《书简选》及后期创作给予了应有的关注。

总之,俄罗斯果戈理研究的宗教倾向是方兴未艾。除了这一趋势,果戈理作为心理分析的大师也越来越受到俄罗斯学者的重视,有的学者甚至认为果戈理的心理分析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理分析更为深刻,更耐人寻味。对果戈理文学遗产的重新认识也是我国研究界正在经历的进程。

我国的果戈理研究始于20世纪20年代。当时果戈理被介绍到中国主要是缘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斗争的需要,注重的是果戈理作品中的揭露和讽刺锋芒。20—30年代,鲁迅、瞿秋白、耿济之等对其创作进行过论述,其中以鲁迅的评论最有代表性:“果戈理几乎可以说是俄国写实派的开山祖师”;(鲁迅 1958:660)“他的文才可真不错”,“他的讽刺是千锤百炼的”;(鲁迅 1976:673,813)40—50年代,果戈理研究主要作为鲁迅研究的附属课题,着眼点在于果戈理对鲁迅的影响。这个时期,我国还译介了3本俄罗斯学者的果戈理专著:斯捷潘诺夫的《果戈理》(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年);赫拉普钦科的《果戈理的〈死魂灵〉》(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7年);斯捷潘诺夫的《果戈理的戏剧创作》(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60—70年代由于国内极左思想和中苏关系的中断,我国果戈理研究出现空白。80年代,我国的果戈理研究重新起步,有了很大进展。

首先,译介了不少俄国和苏联学者的研究成果,如魏列萨耶夫的《果戈理是怎样写作的》(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佐洛图斯基的《果戈理传》(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斯捷潘诺夫的《果戈理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以及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人的评论文章10余篇。

我国学者也迈出了可喜的步伐,推出了自己的论著:有钱中文的《果戈理及其讽刺艺术》(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胡湛珍的《果戈理和他的创作》(北京出版社,1982年),王远泽的《果戈理(1809—1852)》(辽宁人民出版社,1983年)。它们的问世表明,我国对果戈理的研究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深度和广度。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些著述基本上沿用了前苏联和我国对果戈理思想和创作的定论,而且都是传记的形式,篇幅也相对比较小,都不到十万字。

钱中文在《果戈理及其讽刺艺术》一书中主要抓住果戈理创作中“笑”的特点,指出,开始是幽默和嘲讽的笑,后来经过不断变化,发展成为具有深刻社会意义的幽默和讽刺,这使果戈理成为俄罗斯文学中最伟大的讽刺作家之一。他从情节选择和塑造讽刺人物形象所运用的艺术手段两个方面总结了果戈理创作中讽刺艺术的特点:在那种初看起来令人难以置信的荒诞不经的事件里发现其合理性,通过艺术加工,把偶然性最大限度地转化为必然性,从而使情节的冲突具有高度的紧张性和尖锐性。在谈到果戈理后期思想和创作时,钱中文指出:

“现实社会的矛盾进一步尖锐化以及反动势力直接的消极影响，引起果戈理精神的错乱和思想上的深刻危机，并且一发不可收。他过去那种一直处在潜伏状态下的保守的贵族思想意识，公开地暴露出来了。他一反过去创作中所体现的思想原则，公然肯定君主专制，宣称农奴制神圣不可侵犯，并且停止指责和暴露地主、贵族，而称他们为‘人类之花’，说他们能够建立丰功伟绩，为全欧作出榜样；他否认不同社会力量之间斗争的必然性，声称俄国农民顺从成性，不会闹事起哄。果戈理现在把宗教当成了救世之道，……更令人吃惊的是作家居然作了自我否定，说《钦差大臣》纯系伪造，说它并不反映现实生活，其中人物也并非什么社会典型，而不过是些‘人的灵魂’和‘欲望’的化身而已。……果戈理思想上的危机，使他的创作急转直下，引起创作倾向的剧变，并以焚毁《死魂灵》第二部手稿和出版《书简》达到了顶点。”（钱钟文 1980：130-131）“作家在思想危机时期的反动观点，在这部书（指《书简》）中得到了全面的反映。”（钱钟文 1980：133）“他的创作从此也就一蹶不振了。”（钱钟文 1980：137）

而胡湛珍则在《果戈理和他的创作》一书中把果戈理后期的自我完善看作是一种思想上的倒退，并指出这种倒退并非偶然，在早期作品《地鬼》、《肖像》、《罗马》中已露出端倪，而明显的表现是在《死魂灵》第二部的写作当中及《书简》里。在《书简》中，果戈理对以往发表的揭露社会矛盾的作品表示公开忏悔，承认自己对以前所写的一切并不满意，而对于来自反动文人的批评，他表示全部接受。这表明，他已完全陷入了与斯拉夫派合流的泥潭之中，要回到宗教迷信与禁欲主义中去寻找安宁。可见，尽管胡湛珍也与钱中文一样，对果戈理后期的思想和创作持否定的态度且在个别提法上比苏联学者的观点还过头，但不同的是，胡湛珍捕捉到了果戈理思想的延续性。此外，《果戈理和他的创作》的作者还力求把果戈理的创作放入大的文学、历史背景中去考察、分析，指出果戈理继承了卡拉姆辛、茹科夫斯基、普希金这一派革新俄罗斯文学风格的思想，在创作中实践了民族性原则，还继承了拉吉舍夫的人民性传统。

王远泽的《果戈理》也是在肯定前期、否定后期的框框里，没有什么突破。除上述 3 本专论，80 年代的报刊上还发表了不少评论果戈理的文章。其中绝大部分都是老生常谈，但偶而可见不同于以往定论的见解：如汪靖洋在《〈死魂灵〉的形象体系和思想倾向》（南京师院学报，1981 年第 2 期）一文中给《死魂灵》排列出两条“人物序列”，一条是沿着“死亡—逃亡—反抗—造反”这样一道阶梯“逐步上升”的农奴序列，另一条是在人格健全的阶梯上逐步下降的 5 个地主典型，并且强调在其对比中“蕴含着严酷的生活真实和无情的历史规律。”这虽暗合赫拉普钦科关于人民的题材是贯穿长诗的潜流之思想，且有“拔高”之嫌，但对被忽略的农奴形象的重视，是研究深入的表现；又如杨海明的两篇文章——《对果戈理晚期思想的再评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学报，1987 年第 4 期）和《从〈死魂灵〉第二部看果戈理后期的思想探索》（外国文学研究集刊，第 13 辑，1988 年第 9 期），通过对《书简》和《死魂灵》第二部的重新审视和思考，得出结论：1843 年以后的果戈理对专制农奴制现实的认识是清醒的，对它的否定是彻底的；他对俄国前途和出路的探索虽然存在错误，但不是反动的。从而对以往定论进行了争鸣。

80 年代果戈理研究的另一个特点是比较研究占较大比重。首当其冲的仍是传统题目——果戈理与鲁迅。除报刊上大量的评论文章，这一时期比较重要的论著有韩长经的《鲁迅与俄罗斯古典文学》（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 年）和王富仁的《鲁迅前期小说与俄罗斯文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 年）。韩长经在《果戈理与鲁迅》一章中主要分析了鲁迅对果戈理的评价，认为他不仅看到了果戈理在创作上的成就，而且看到其世界观和作品中的弱点，比较全面。王富仁在其书中涉及果戈理的部分里分析了两篇《狂人日记》的共同之处，继而指出果戈理以切实而根本地探索社会为己任，注重对人物精神世界和灵魂的深入挖掘，把社会和心理两种因素紧密结合起来，认为果戈理的作品是由强烈的喜剧性向真实性趋近。除了鲁迅，

还有许许多多中外作家被引入与果戈理相比较的研究视野：巴金、吴敬梓、陈白尘、冯骥才、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费定、狄更斯、卡夫卡、莫里哀、马克·吐温等等，研究的广度不断扩展。

90年代以来，我国学者做过一些非常有益的工作：一批过去没有中译文的、不同派别、不同观点的重要评论被译介过来，集中地体现在袁晚禾、陈殿兴编选的《果戈理评论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中。

研究中也出现了新迹象：程正民在其《俄国作家创作心理研究》一书第二章《果戈理：气质、生命力和创作》中，从创作心理学的角度对果戈理的气质、才华、身心状态、情感状态与创作的关系进行观照，指出：果戈理的气质对他创作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从选材到人物，无不受到自身心理和气质影响、“以对自己的心理和气质的体验为基础。”（程正民 1990：44）同时，作家的心理和气质与创作关系“并不是一种表层的、外在的、直线的关系，而是一种深层的、内在的、曲折的关系。”（程正民 1990：46）作者据此阐释了为什么在果戈理的创作中前期和后期风格迥异且欢乐浪漫的情调和喜剧性总是与苦闷忧郁的声息和悲剧性相交织，认为作家的忧郁气质是根本的，是经常起作用的因素，它使作家的心理失衡，作家常常需要通过创作来宣泄苦闷和忧郁，达到心理平衡，而采取什么形式来宣泄，那不是绝对的，作家可以根据自己对生活认识的深化和审美情趣的变化而采用不同的形式。作者还试图从生理和心理与创作的关系方面解释果戈理晚期的创作现象，但由于以“精神危机”的成见为出发点，所以得出结论：“作家思想上的迷误和精神上的危机造成心灵的疲惫，而心灵的疲惫又加重了他的疾病。生理和心理的疾病最后使得果戈理身心交瘁，以致完全丧失创作能力。”（程正民 1990：61）

王志耕的《果戈理与中国》一文¹从文学接受的角度探讨了中国对果戈理的接受特点及他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指出中国对果戈理的接受除了外在形态上的认同，更有构成艺术共鸣的心理因素背后的文化意识或民族心理结构上的认同，即禁欲主义的审美态度。但中国的禁欲主义和俄罗斯的禁欲主义的价值取向不同，这种差异决定了中国对果戈理接受的特征是在审美体验上“超然物外”，而不像果戈理那样“自居”，主客体融为一体。文章还对我国果戈理研究今后的发展方向进行了展望，认为扭转思维定势，转换角度，减弱社会功利性，加强文学本体方向的研究，进入道德批评和道德完善境界，这将是未来的发展趋势。

任光宣的专著《俄国文学与宗教》（1996年）中第一次出现“果戈理现象”的提法，并把《书简》一书作为现象之一（另一个现象是《死魂灵》）加以研究，指出，《书简》是一部“用宗教道德观去回答俄国现实的种种问题”的作品，“无论这部书有多少错误和言过其实之处，也无论我们去怎样看待作家在书中表达的观点，但这部书是本真实的书，是一部用说教代替形象，全面展示作者的宗教观的作品，这是一部最能表现‘果戈理现象’的作品”，认为“果戈理的说教和预见的力量也像他的诗意般的创作激情，讽刺幽默技巧，描绘大自然的禀赋一样，是作家的文学才能武库的组成部分。”（任光宣 1995：166，177）书中还谈到俄国19世纪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涅克拉索夫、屠格涅夫对《书简》有过与别林斯基不同的看法，但未引起足够的重视；长期以来对这本书缺少认真的阅读和研究。

此外，我国在1999年出版了9卷本《果戈理全集》，其中中译本《书简》有史以来第一次与我国读者见面。在为《书简》所写的《题解》中，周启超对《书简》的历史命运、思想内容和对后世的影响作了简要概括；文学杂志上也陆续刊出了一些运用新的文学批评理论、从新的视角来审视、评价果戈理的文学遗产的文章，如：任光宣的《论果戈理创作中的宗教观念》（外国文学评论，1993年第4期）、克冰的《果戈理与魔幻现实主义》（内蒙古师大学报·哲社版，1994年第3期）、周启超的《“思想家”果戈理颇受推重》（外国文学评论，1997年第3期）、龚善举的《象征：果戈理艺术思维的“原型”批判》（外国文学研究，1999年

第3期)、任光宣的《分歧由何而来——评林斯基与果戈理就〈书简〉一书的论争》(俄罗斯文艺, 2001年第3期)、《果戈理的精神遗嘱——读〈书简〉》(国外文学, 2001年第4期)、《虔诚的信仰, 深邃的思想——果戈理的〈书简〉中的文学思想》(外国文学, 2001年第5期)等等。这些迹象昭示了我国果戈理研究的新方向。不可否认的是, 比较研究的势头依然强劲, 传统的作品和人物现象分析还占主导地位。

总之, 在我国, 虽说从总体上看果戈理研究还没有形成象“普希金研究”、“托尔斯泰研究”那样较具规模的研究方向, 而且长期以来, 在对果戈理的生平和创作所作的基本梳理和研究中, 对《书简》的观点都沿用了前苏联和我国对果戈理思想和创作的定论, 而且个别表述明显暴露出基于评论而评论的弱点, 但近10年来, 我国研究者开始把果戈理研究纳入俄罗斯文化的大背景下, 对新的文学批评理论的运用也更加自觉, 尤其在对以《书简》为代表的果戈理后期创作的研究和评价上出现了转机, 不再像以前那样一个调门。

对果戈理文学遗产的重新阐释势必会改变我们对作家的认识图景。随着果戈理文学遗产在世界范围内的再发掘、重阐释, 人们对果戈理思想和创作的认识将不断深化, 果戈理的形象也将更加完整。

附注

- 1 为王智量等著的《俄国文学与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1年)一书中第一章。

参考文献

- [1] Манн Ю. 1986 Гоголь — критик и публицист [A] //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7-ми т, Т. 6 [C]... М.
[2] Золотусский И. 1984 Гоголь [M], М.
[3] Вопросы литературы. 1980. № 9.
[4] Волгин И. 1980 Уроки Гоголя [J] // Новый мир. №12.
[5] Бердников Г. 1982 О партийном отношении к классическому литературному наследию [J] // Знамя. . №8.
[6] Дунаев М. М. 1996 Православие и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Т. 1 [M], М.
[7] Гончаров С. А. 1997 Творчество Н. В. Гоголя в религиозно-мистическом контексте [M], СПб.
[8] 鲁迅 1958 鼻子·译后记//鲁迅译文集第10卷,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9] 鲁迅 1976 鲁迅书信集下卷,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0] 钱中文 1980 果戈理及其讽刺艺术 [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1] 程正民 1990 俄国作家创作心理研究 [M], 百花文艺出版社。
[12] 任光宣 1995 俄国文学与宗教 [M], 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Review of Studies on Gogol in Russia and in China since 1980's

LIU Hong-bo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1980s, new trends have emerged in the study of Gogol both in Russia and in China . In Russia, these trends mainly reflect in the attention to and a fresh explanation for Gogol's creation in his later years, as well as in the fresh interpretation of his complete works in religious context. In China, the same trends seem to have just been started.

Key words: Gogol ; studies; new trends; religious context

收稿日期: 2004-04-19

作者简介: 刘洪波(1965—), 黑龙江肇源人,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俄语系讲师。研究方向: 俄罗斯文学。

[责任编辑: 刘 铨]